

《死者未离场：“反叛的永生性”与政治时间的延展》 | 《区域动态》

11月第2期

摘要：论文《烈士、梦境与前世：反叛的永生性与负债关系的扩展逻辑》（*Martyrs, Dreams, and Past Lives: Insurgent Immortality and the Expansive Logic of Debt*），通过对库尔德政治运动中“梦见烈士”的经验与以色列占领下戈兰高地德鲁兹社区“前世转生”叙事的民族志比较，揭示被压迫群体如何以“反叛的永生性”（insurgent immortality）抵抗国家对生命与死亡的主权化界定。谢弗斯与卡斯特里努的研究超越宗教象征与心理学解释，将梦境与转世理解为社会再生产的机制，提出一种以“延迟互惠”、“普遍化负债”与“跨世参与”为核心的政治伦理，展示在被占领与无国状态中，共同体如何借助记忆、义务与灵魂转世得以延续。

本文评论的是刊登在《社会与历史中的比较研究》（*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*）的研究论文《烈士、梦境与前世：反叛的永生性与负债关系的扩展逻辑》（*Martyrs, Dreams, and Past Lives: Insurgent Immortality and the Expansive Logic of Debt*），由乌德勒支大学的玛琳·谢弗斯（Marlene Schäfers）与伦敦布鲁内尔大学的玛丽亚·卡斯特里努（Maria Kastrinou）合著。作者从两处地理与政治上相互独立的田野入手——一是土耳其库尔德运动中的“梦见烈士”经验，二是以色列占领下叙利亚戈兰高地德鲁兹社区关于“前世转生”（التقمص، al-taqammuṣ）的叙事。二者共同回应一个根本问题：死者真的会离开政治吗？

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经验中，梦见牺牲烈士（şehîd）是普遍的体验，烈士并未消逝，而是在梦中“回返”（return），参与活人的日常，对梦者进行提醒、安慰、命令或鼓舞。这种梦被视为灵魂（ruh/rih）留给生者潜意识的印象，并转化为“行动召唤”（call to action），促使梦者加倍投身于公共事务，或在情感上重新承担“未竟之事”（unfinished business）。作者由此将这种“回返”机制在政治上定义为一种“延迟互惠”（delayed reciprocity）。这种互惠的核心在于其“延迟的时间性”（temporality of delay）：烈士的牺牲本可引燃即时的复仇行动，但“等待”策略巧妙地将这种即刻的交换转化为一种面向未来的、长期性的支出与回报经济。正是这种战略性的延迟，确立了生者与逝者之间神圣的负债关系，使烈士的牺牲升华为生者永远无法偿清的“普遍化

债务”（generalized debt），进而成为库尔德社会性的根基和政治共同体的坚固边界。因此，履行铭记烈士事迹、效仿其奉献的持续性道德义务，是实现“使烈士长存”（şehitleri yaşatmak）这一根本要求的关键。任何对烈士的遗忘、漠视或否定，都将被视为对共同体核心债务的严重违约，它将无可挽回地削弱社会内部的互信网络与象征性连结，最终导致基于殉道记忆所建构的扩张性社会网络迅速收缩乃至崩解。

在戈兰高地德鲁兹人的故事中，死者“以孩子之身再生”，他们凭着对前世亲属与家园的记忆，穿越族群、年龄与国界的界线。德鲁兹神学将灵魂（الروح, al-rūḥ）视为在本社群内部循环不息的存在——“人死去，片刻之后便在母亲怀里饮乳”。因此，死亡对于德鲁兹人而言，并非终点，而是持续的过渡，亡者以新生之身再度回归社会。由此，高度安全化的政治边界在此显现出一种深刻的悖论：在现实层面，跨越隔离栅栏往往须经“红新月会”撮合，一旦越界，便难以回返，个体以离家的痛楚换取更广阔亲属网络的延展；而在信仰层面，灵魂的循环却能超越护栏、章戳与检查站，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自由流动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“前世—今生”的叙事把死亡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在场，维系起跨境的“扩展亲属网络”（expanded kinship network），为被占领之下的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反主权的集体身份与时间感：它不依赖领土封闭与行政编制，而倚靠灵魂循环、亲属再连结与代际义务的延展，使共同体得以在边界之上延续、扩张与自我再生产。许多（虽非所有）戈兰德鲁兹人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“神学常识”，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勇气伦理——“我们无畏死亡，因为有 al-taqammuṣ（转世）。”

谢弗斯与卡斯特里努提出“反叛的永生性”（insurgent immortality）这一概念，揭示被压迫群体在死亡与记忆之间持续生成的社会与政治意义。该概念参照詹姆斯·霍尔斯顿（James Holston, 2008）的“反叛的公民性”（insurgent citizenship），以及朱迪斯·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, 2009）关于“可哀悼性”（grievability）的论述，指向一种超越肉体死亡、延续抵抗主体性的存在形式。二人指出，殉难与转生并非单纯的宗教象征，而是一种反主权的社会实践，现代国家通过边界、户籍与法律区分“生”与“死”、“此岸”与“彼岸”，以此确立对生命的管辖权与主权秩序。而“反叛的永生性”则不断跨越这些制度界限，使死者的名字、遗体、记忆与债务在社会之中持续流通与再生。在此过程中，殉难与转世成为社会延续的核心机制，促成并强化代际与人际间的相互负债关系：生者通过纪念烈士、继承其事业来履行“代际债务”；而死者则通过梦境、传说或被视为转世的灵魂“回返”人间，以提醒、安慰或激励生者，从而继续参与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。这种循环的“互负与互偿”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伦理，它不依赖领土、制度或暴

力，而依托记忆、情感与义务所构筑的负债网络，动员逝者的象征力量，将他们转化为社会活力与政治能量的源泉。“反叛的永生性”并非通过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来延续共同体，而是通过对来世与记忆的主动耕耘，使无国籍或被压迫的社群能够在占领与边界之下持续繁衍、更新与扩张，从而构建出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生死共同体。

该文并非着眼于信仰本身，而是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出发，重新思考梦境与转世等看似“超越性”的经验在社会生成中的位置。作者以民族志的细读揭示，这些经验并非个体灵性的表征，而是构筑群体连带与政治主体性的实践形式。在梦中与死者相遇，不是逃避现实的幻觉，而是一种使现实重新获得能量的社会行为，在无国与被占的现实环境之中，这种“不死的关系”成为抵抗得以持续的时间机制。两位学者刻意与当代人类学中常见的“阴魂不散/幽灵学（haunting/hauntology）”框架拉开距离，承认“幽灵学”帮助人类学打破线性时间与人类中心主义，但也指出“幽灵学”这一语汇容易把死者的在场预设为“惊惧、无端、被动的剩余”，在该文的两个田野案例中，死者是被主动滋养与反复召回的社会行动者，是生成性的政治资源。由此，“反叛的永生性”不是一种宗教象征，而成为一种关于时间、债务与社会再生产的政治逻辑，在延迟与互惠之中维系，在记忆与抵抗之中延展。

在研究方法上，该文采用并置式比较的民族志路径，通过跨场域的对照分析，“藉比照以生新义”（foster conceptual innovation by way of comparison）。库尔德地区与德鲁兹人居住的戈兰高地虽然地理与政治上互不隶属，却同样处于无国与被占、少数化与边界军事化的结构之中，作者并非意在证明两者的相似性，而是通过对照揭示它们共享的结构性处境——即在生死阈限上进行社会再生产。殉难通过“延迟—外推”的时间逻辑实现向外扩张，转生则以“循环—回返”的模式维系跨代连续；两者共同通过记忆、纪念与叙述构建起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债务与义务网络，使社群得以穿越领土与时间的边界而持续扩展。

然而，该文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仍留下若干未竟之处。作者以“债务”与“交换”的框架解释生死关系，虽然具有高度的解释力，却也让悲痛与哀悼的复杂性被纳入一种可计量的逻辑之中。当情感被折算为社会连带的等价形式，它既显露出团结的可能，也暗含新的规训结构，倘若“反叛的永生性”在实践中被制度化，例如通过纪念碑、烈士陵园或国家化的象征仪式加以重塑，它原初的反主权意涵或许将被重新吸纳为秩序的一部分。由此，该文的理论贡献不在于提供一个完整的伦理模型，而在于揭示这种伦

理内部的矛盾，即记忆与抵抗并非彼此对立的两极，而是在相互生成中不断被时间与权力改写。

总体而言，这篇论文以极高的敏感度捕捉研究对象在“死亡之后”继续存在的方式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战争与流亡的漫长过程中，人们如何通过梦、记忆与再生，使逝者的痕迹得以“回返”。谢弗斯与卡斯特里努提醒我们，政治并不只发生在国家的会议厅，也可能在梦中、墓旁或孩子的语言里继续展开，在那未竟的时间里，死者并未离开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——持续地、反叛地——活着。

徐鸿鑫，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。